

职务犯罪、涉黑犯罪、金融犯罪服刑者,较之其他罪犯,减刑幅度大,假释比例高,有的犯罪人采取假计分、假立功、假鉴定获取减刑、假释。11月5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后——

减刑、假释“篱笆”扎紧 权不好使 钱不好用

■本报记者 卢越

11月5日,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在监狱系统内完成了对职务犯罪、涉黑犯罪、金融犯罪“三类罪犯”服刑者的全数复查,特别是对于保外就医的,每一个都须在指定医院进行复查,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坚决依法收监,切实依法规范监狱包括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在内的各项执法工作。

在此之前的1月21日,中央政法委下发《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五号文件),要求对被判处重刑的职务犯罪、涉黑犯罪、金融犯罪等“三类罪犯”服刑者,从严把握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标准。落马官员逃避刑罚成为此举重点打击的领域。

减刑、假释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的具体体现,对于鼓励罪犯改造、促进罪犯回归社会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被一些落马服刑官员“盯”上,成为他们提前走出牢门、获得相对自由的手段。

“三类罪犯”违法减刑、假释频现

“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一些违法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案件确实存在。”张苏军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监狱在执法过程中客观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

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厅长袁其国透露,今年开始的专项检察活动中,“三类罪犯”存在问题突出,较之普通罪犯,减刑期间短,减刑幅度大,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有的罪犯采取假计分、假立功、假鉴定等手段违法获取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死刑缓期2年的执行期间尚不包括在内;无期徒刑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3年。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的贪腐官员通过违法减刑或假释,实际刑期相对更少。根据最高检公布的案例,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总裁张海,2007年因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张海利用假立功材料并指使他人为其虚假申报实用新型专利,两次获得减刑,并于2011年1月被释放。

目前,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撤销了对张海的两次减刑裁定,因张海已逃往境外,有关部门正在启动追捕和引渡程序。

2011年,广东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黄少雄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3月,广东省高院网公示的拟减名单显示,揭阳监狱提请为其减至有期徒刑18年。该申请被法院退回,意味着黄少雄将在狱中“多待会儿”。今年以来,关于严格执行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一系列监管措施,让想要通过以权“赎身”,花钱“买刑”提前出狱的服刑官员日子变得难熬。

今年1月中旬,广东省高院在其网站上公示了受理刑罚执行机关(监狱)提请对733名罪犯减刑的案件。5月初,该院网站对这733名提请减刑的罪犯的裁定结果进行了公示,其中11人被裁定不予减刑,其中包括黄少雄。

袁其国对此表示,长期以来,在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一般不对公众公开,存在极易滋生腐败的空间,并引发公众对腐败的猜疑和想象。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法院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以及个别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权钱交易、失职渎职,导致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形屡有发生。

出台新规扎牢“篱笆”

“五号文件”明确规定,拟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一律提前予以公示;减刑、假释裁定书及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一律上网公开;对“三类罪犯”中因重大立功而提请减刑、假释的案件,原属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组织(领导、包庇、纵容)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原判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开庭审理。

此外,对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向中央政法相关单位逐案报请备案审查;对原县处级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向省级政法相关单位逐案报请备案审查。

按照“五号文件”的新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执行3年以上方可减刑,无期徒刑罪犯经过几次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最低不会少于17年;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执行3年以上方可减刑,经过几次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最低也不会少于22年。

有专家指出,这样一来,即使“三类罪犯”具备所有减刑条件,无期徒刑罪犯经过几次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将比按之前规定

的延长4年;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几次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将比按之前规定的延长5年。

“五号文件”出台后,司法部、两高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制定细则。今年8月,最高检制定下发《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规定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三类罪犯”逐一建档审查;对保外就医者重新体检。

根据最高检今年8月份的通报,全国检察机关已建议将711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76人。

“刚刚出台的《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是贯彻‘五号文件’的重要举措,使得监狱内部做基础工作的减刑、假释工作的条件、标准、程序更加明确、严格。”张苏军表示,“将积极推行狱务公开试点,对涉及到减刑、假释计分考核办法进行修改完善,促进减刑、假释工作更加科学、规范。”

典型案例

●案件

2009年7月,广东省江门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林崇中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羁押期间,河源市看守所政治教导员涂亚迪、医务室负责人吴景卫串通河源市人民医院医生蒋爱忠和张明杰,制作高血压等疾病的虚假鉴定材料。河源中院据此对林崇中作出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

●处理

涂亚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吴景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林崇中已于2010年12月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

●案件

2011年下半年至2014年年初,江苏省通州监狱九监区原监区长施健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服刑罪犯亲属和业务单位负责人贿赂,违反罪犯计分考核奖励、特定岗位罪犯管理等规定,弄虚作假,为有关服刑罪犯报请减刑、假释。

●处理

2014年7月29日,海安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以受贿罪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罪判处被告人施健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上缴国库。

把“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落实落细

——上海二中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侧记

■新华社记者 黄安琪

作为最高法院确定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和上海市司法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试点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方面的改革探索已初具成效。

让审理者裁判, “丢掉拐杖,挑起担子”

合议庭是法院的审判组织,负责具体案件的审理工作,中级法院的所有案件均由合议庭审理并作出裁判。

以往由于案多人少,案件的审理工作在合议庭成员之间分工不平衡,“合而不议”“参而不审”等现象突出。为此上海二中院制定了《合议庭运行工作规定(试行)》,确立了合议庭成员共同负责下的主审法官责任制,落实合议庭作为法定审判组织对案件审理共同负责的法律属性,强化合议庭成员在主

审法官主持下共同参与、分工配合审理案件,强化主审法官在主持庭审、控制流程、组织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方面的岗位职责。

“以前在案件的处理、裁判文书的制作中有一定的惰性和依赖心理,总是希望庭长、审判长这些经验丰富的入能够‘把把关’,现在,不得不‘丢掉拐杖,挑起担子’。”上海二中院的郭寅法官坦言。

今年4月至9月改革试点期间,二中院受理并已审结的5504件案件中,由合议庭评议后直接处理的有5388件,占97.89%。合议庭内部运行也更加规范,尤其在庭审阶段听审、提问、质证、认证等环节,合议庭成员共同参与程度较改革之前有明显提高。

由裁判者负责: 实行阳光监督

为了将裁判者行使权力的全程置于“阳光监督”之下,上海二中院制定了《案件质量评查工作规定(试行)》《关于案件差错和违

审判责任追究的若干规定(试行)》《涉廉事项报告规定(试行)》《案件廉政回访制度规定》等多项规定。

据悉,自2011年开始,上海二中院在上海法院中率先推出案件廉政回访制度,按照“法院牵头、群众参与、共同监督”的总体要求,向当事人回访法官廉洁司法以及司法作风等情况。

在本次改革中,上海二中院又进一步修订完善《案件廉政回访制度规定》。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案件廉政回访范围,丰富案件回访方法,健全回访考核机制,完善回访监督手段,以实实在在的举措践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确保司法清正廉洁。

去行政化: “负面清单”“全程留痕”给领导戴上“紧箍咒”

上海二中院对院院长的审判管理监督职

责采取“清单管理”的模式,厘清了院庭长对于案件的审判权与对于院、庭事务的审判管理职权之间的界限。

“权力清单”,从正面规定院、庭长的审判管理职权,包括审判质效管理与讲评、研究法律适用统一、法定程序事项审批等;“负面清单”,规定院、庭长不得越级或超越分管范围进行管理,不得强令合议庭改变评议意见等。

此外,院庭长对个案进行监督、指导均以主审法官联席会议、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等组织化的方式进行。院庭长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建议要记入会议记录并归卷或留存,做到“全程留痕”。试点期间,通过两个会议后审结案件为2.03%,相比改革前通过院庭长听取案件汇报、参与讨论的案件数有明显下降。

上海二中院民二庭庭长马全耀表示,“负面清单”和“全程留痕”给院庭长们戴上了“紧箍咒”,对具体案件,院庭长们不能随意进行行政干预。



北京“民告官” 副区长应诉

10月28日,在北京市高院开庭审理的一起“民告官”二审案件中,丰台区副区长刘宇(左)出庭应诉。庭审结束后,刘宇表示感谢上诉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并监督政府的工作。

“副区长出庭我确实有些意外。”该案上诉人代理律师说。

李飞/CFP

青海警方 收缴非法枪支1000余支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获悉,自今年年初开展缉枪治爆专项行动以来,全省共收缴各类非法枪支1092支(仿真枪667支)、子弹16699发,雷管383枚,管制刀具3758把,剧毒化学品71.2公斤。据悉,青海警方通过制定下发群众举报涉枪涉爆违法犯罪奖励标准,张贴关于收缴非法爆炸物品、枪支弹药、剧毒化学品和管制刀具的通告,设置咨询台接受咨询、现场讲解枪支、爆炸物给社会安定带来的危害性等形式,使群众亲身感受到了私藏枪支和爆炸物等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

广西柳州 集中开展消防夜查行动

本报讯 10月份以来,柳州市消防支队柳城大队出动执法检查组,深入辖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突击夜查行动。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向存在隐患的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单位负责人及时整改,并要求各商场负责人要提高认识,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按时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做好员工消防教育培训,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目前,检查组共检查单位67家,发现火灾隐患115处,现场整改93余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23份,为社会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蒋承志)

河北阜平 严查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

本报讯 日前,河北省阜平县公安局在开展“秋收100”打击整治行动中,大力整治全县道路交通秩序,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良好交通环境。

据悉,该局交警部门对城区和省道公路沿线繁华村镇等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实施不间断查控,在城区主要街道、重点路口、关键部位设立经常性执勤卡点,适时组织开展集中统一行动,对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查处打击。目前,该局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48例,侦办醉酒驾驶刑事案件12起,刑事拘留12人。(李永进)

上海铁警 首设“危险液体检测仪”

本报讯 上海铁路警方再次提升安检等级,在铁路上海站、上海南站及虹桥站等三大客运站率先引进“危险液体检测仪”,对进站旅客携带的液体进行精密检查,严防危险品、违禁品带进站、带上车。“危险液体检测仪”的使用,在全国铁路系统属于首创。上海铁路警方负责人表示:“这个仪器的优势主要是快速确定外包装的不明液体成分。过去,对于部分不明液体,安检人员经常会与当事人之间有分歧,或者需要旅客开瓶喝一口,耗时耗力,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有了该仪器后,判断识别率、效率都会大幅提高。”(林荣贵)

立案审查制与立案登记制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其中一个亮点是:“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立案审查制和立案登记制有何区别?目前,我国法院案件受理采取立案审查制。即法院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查,而后决定是否受理。

法林 (第11期) 雨霖

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据此,案件当事人提交诉状后,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进入诉讼程序。否则法院有可能拒收诉状,不予立案,诉讼程序便无从开始。

立案登记制,是一种与立案审查制相对应的立案制度。立案登记制的最大不同,是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诉状,法院无需进行审查,法院应立案登记,不得拒收当事人的起诉状。

总体来看,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虽然在有关案件受理的程序和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就受理案件的方式而言,都是采用“登记立案”模式。两大法系的立案制度,基本上均认为诉讼程序应由当事人启动。即只要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就产生约束原告、被告和法院的诉讼关系。尤其是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在立案机制上体现为法院对当事人的起诉尽可能少地限制,让双方当事人诉讼程序中通过对抗和辩论解决纠纷;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虽然职权主义的色彩较为浓厚,但法院依职权的介入更多地体现在后续的审理程序中。